

大專院校學生輔導管教的挑戰與因應

蕭珮婕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講師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當代高等教育中，不同於過去以知識傳授為主的教育模式，因此學生輔導管教議題重要性日益凸顯，且隨著台灣社會價值觀日益多元，學生身心發展與行為表現也愈趨複雜，大專院校在學生輔導與管教方面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當代大學生來自多元背景，不僅在學習態度上呈現出更多差異，也在心理健康、情緒調節、人際互動、行為紀律等方面出現複雜化的趨勢（王淑慧，2020；吳俊穎，2023）。

現代大專院校需同時面對學生因心理困擾而求助輔導單位的比例明顯上升，包含焦慮、憂鬱、自傷行為等議題日益常見。此外，教師結構的變遷與兼任人力依賴，導致教師流動性上升，進一步削弱學校作為穩定支持系統的角色，加上校園中隱蔽的學生霸凌現象與少子化導致的生源變化，使輔導與管教機制面臨更大挑戰（李宗翰，2021；李明志，2021；張惠雅，2022；Chang & Hsieh2020）。

許多大學教師與學生事務人員皆反映學生自我中心意識增強、挫折容忍度降低，導致在管教過程中容易產生誤解與對立，而部分學校因資源限制或制度不夠健全，輔導系統無法即時有效地協助學生，反而導致問題學生成為校園事件的「定時炸彈」（王淑慧，2020；吳俊穎，2023）。例如，在某些學生申訴案件中，學校缺乏適切的調解機制，讓學生與教職員之間的關係更加緊繃。此外，部分學生因不服學校管教規範，而濫用人權、自由等語言框架，使校園紀律維護愈發困難。

在此背景下，許多大專校院積極推動各項措施，包括增設心理健康資源、推動正向行為支持系統、導入修復式正義教育理念、培訓導師與學生事務人員輔導知能等。然而，這些努力往往分散於不同單位之間，缺乏整體系統性整合，且尚未充分納入教育性輔導與紀律性處遇的平衡思維，導致輔導與管教政策效益未臻理想。

因此，本文擬探討目前大專院校在學生輔導與管教方面所面臨的核心問題，包括心理健康困境、行為偏差處遇、價值觀對立與校園衝突調解之困難，並進一步分析當前制度之不足與矛盾，嘗試提出具體且可行的因應對策與系統性建議，以期推動高等教育階段學生輔導工作的全面升級，營造正向健康的校園環境。

本文以教師流動性高、學生霸凌與少子化為主軸，分析當前高教環境中學生輔導與管教的困境，並提出具體政策建議與實務策略，期能對教育現場與政策制定者提供實質參考

二、大專校園學生輔導與管教的挑戰

（一）教師流動性高，影響學生支持系統的穩定性

根據教育部（2023）統計，私立大專院校兼任教師比例已逾四成，許多青年教師因缺乏長期聘任機會，頻繁轉職。此現象不僅影響教學品質，也阻礙師生間信任關係的建立（李明志，2021），使教師難以觀察學生行為變化，及時轉介輔導。

在高教市場化趨勢下，學校依賴短期聘用與兼任人力，導致師資結構不穩，輔導關係難以延續，教師停留時間短，降低學生求助意願，也削弱了情感支持與心理關懷的連續性（Chang & Hsieh, 2020；李宗翰，2021）。教師流動性已成為輔導工作的潛在阻力，亟待制度性解決。

教師流動性高不僅衝擊教學品質，也弱化學生支持系統的穩定性與效能，是當前輔導工作的隱性阻力，值得制度層面深入檢討。

（二）學生霸凌行為隱微化與系統性處理困難

傳統認知中霸凌行為多與中小學階段相關，然而在大專校園中，語言排擠、排擠式社群行為、網路攻擊等「隱性霸凌」現象逐漸浮現。大學生自陳曾遭遇同儕排擠或情緒勒索，但多數未尋求協助，因擔心報復或被視為「不成熟」。

霸凌事件常發生於宿舍、社團、系所自治組織等，教師難以直接監督的領域，使得學校難以及時介入。此外，霸凌行為往往結合權力結構（如：學長制、社團階層），加深受害者的無力感。

大專校園中的霸凌行為具有隱蔽性與結構性，學校若僅依賴事後通報與懲戒手段，難以有效預防與矯正，需建立更前瞻與具支持性的介入機制。

（三）學生心理健康需求快速上升

大專學生面臨學業、人際、家庭與就業等多重壓力，心理問題逐年升高。根據教育部（2022）資料，學生對心理輔導的需求已連續五年成長，憂鬱、焦慮與自我傷害案例明顯增加。

然而，多數校園輔導人力嚴重不足，單一輔導教師需服務上千名學生，難以提供深入、連續的協助。資源不足、求助污名與管道不透明，使輔導服

務落差日益擴大，甚至影響校園安全與學生發展（林佩君，2021；黃怡萱，2020）。

（四）少子化衝擊下的學生組成變化與輔導壓力

臺灣進入少子化社會後，大專院校招生壓力日益加劇，許多學校為維持生源，不得不降低入學門檻或大幅招收境外學生與轉學生，導致學生來源愈加多元，個別差異也更加明顯（王淑慧，2020；吳俊穎，2023）。

因此，學生在學習動機、生活適應、文化背景與價值觀等方面落差大，學校輔導與管教工作難度隨之上升。例如部分學生可能缺乏基本的學習自律與情緒管理能力，容易出現課堂失序、逃課或人際衝突等問題。同時，造成師資與行政資源重整、校園氣氛不穩，也間接影響學生的安全感與歸屬感，增加心理輔導需求。

少子化造成的學生來源多元與學校制度不穩定，使得大專校園內的輔導與管教工作面對更多元挑戰，學校必須強化個別化支持與文化敏感性輔導，以因應學習與適應落差擴大的趨勢。

三、因應對策與系統性建議

面對大專校園學生心理健康問題、行為偏差、價值多元與校園衝突等現象，大學校方與教育主管機關需進行制度性革新，從組織整合、專業支持、預警機制、正向文化到跨域合作，打造一套可長可久、具教育性與修復性的學生支持系統。以下提出具體的六項策略：

（一）強化跨單位整合與制度協調機制

當前多數大學學生事務由學務處、教務處、人事室等多個單位分工負責，導致輔導與管教工作資訊分散、缺乏整合，行政系統呈現斷裂。建議由學校高層主責成立「學生支持整合平台」，統籌心理輔導、導師制度、學習支持與生活管理等事務，建立跨處室協作機制，推動學生資料共享與數位化預警系統（early warning system），強化問題學生的早期辨識與即時支援能力。

（二）充實師資知能與專業支援資源

教師與導師作為第一線觀察與輔導人員，應具備辨識與因應學生心理與行為問題的能力。建議教育部設立「高教學輔發展中心」，統籌各校在職培訓資源，開發學生心理健康、正向管教、修復式對話等主題的進修課程與實務手冊，並建立案例資料庫供教師使用。同時應擴增校內專業人力編制，如心理師、社工師、危機專員等，以分擔教師與導師壓力，提升輔導品質與效能（王淑慧，

2020；教育部，2022；Chang & Hsieh, 2020）。

（三）建立早期預警機制與多管道求助系統

學校應整合教務、學務、住宿輔導、社團參與等資料，建置一套資料驅動的早期預警平台，能及時偵測異常行為徵兆（如課業表現下滑、缺席率上升、人際衝突等），並透過資訊串聯主動通知相關單位介入處理。此外，也應建置多元求助通道（如線上匿名諮詢、LINE BOT、自助心理檢測平台），降低學生求助門檻，提升協助的可近性與即時性（Wang & Lin, 2019；黃怡萱，2020）。

（四）推動修復式正義與教育性處遇制度

針對學生偏差行為與違規事件，應避免單一懲罰導向處理，轉向具教育性與人際修復功能的制度。可參照部分大學推行之經驗，成立「校園修復對話小組」，由加害者、被害者、導師與輔導人員共同參與，進行對話與反思，協助學生學習責任承擔、修補關係並制定具體改善行動。此舉除保有紀律維持功能外，更強化學生內在價值轉化與自我成長（陳怡君，2023；Wang & Lin, 2019）。

（五）強化學生自治與正向行為文化建構

有效的學生管教應轉向培育學生自律與公民責任。學校可透過學生會、系學會與各類社團，推動「正向行為倡議計畫」，鼓勵學生參與制定班級規範、衝突處理準則，並舉辦如「對話週」、「校園和平日」、「心理健康日」等公共活動，讓輔導與管教由被動反應轉化為主動文化養成的過程。

（六）建立校外支持資源連結網絡

當學生問題超出校內處理範疇（如精神疾病、司法介入、家庭危機等），學校應建立與醫療、司法、家庭與社政機構的合作通道，成立「校外支持轉介平台」，透過個案管理制度協助學生獲得整合性支持服務。此舉不僅能延伸校內輔導網絡，更能保障學生全人發展與危機處理的周全性。

有效的應對策略應結合制度改革、資源配置與文化轉化。唯有全校動員與價值重塑，方能真正提升學生輔導與管教品質。

四、結語

本文針對大專院校學生輔導與管教面臨的挑戰進行分析，指出當前教育現場面對的多重壓力，包括心理健康需求升高、行為偏差與校園衝突事件頻繁、價值觀日益分歧等，均使輔導與管教工作愈加困難且複雜。雖然多數大學已嘗

試建置相關資源與制度，惟整體而言仍缺乏跨單位整合與教育性取向的系統性設計。

本研究呼應教育為本的理念，強調應將輔導與管教視為高等教育培育成熟公民的關鍵任務，並提出以下幾點具體建言：第一，整合校內學生支持資源，建立跨單位協作平台；第二，充實師資培訓與專業輔導人力配置；第三，推動修復式正義教育制度，讓紀律處遇轉向反思與重建；第四，促進學生參與與行為文化自我建構；第五，串聯校外網絡資源，形成完整支持系統。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修復式正義」在大專教育的推動應跳脫司法懲罰框架，透過具體制度設計如導入「對話調解機制」、舉辦「行為反思工作坊」、設立「行為復原觀察期」等具體做法，協助學生理解自身行為的影響，進而學會尊重、修復與承擔。

未來高等教育應重新定位輔導與管教的價值與意義，從單一對事件處理的消極角色，轉向主動促進學生身心成熟的教育角色，以制度支持、文化引導與價值共構為核心，建構具韌性與關懷的校園生態系。

未來研究建議可進一步透過實證調查，檢視各項對策之施行成效與學生回饋，作為政策規劃與制度調整的依據。

參考文獻

- 王淑慧（2020）。大學校園輔導工作的制度與實務挑戰。**教育研究月刊**，320，45-58。
- 吳俊穎（2023）。少子化下大學招生與學生輔導的挑戰。**教育與社會**，40(2)，25-43。
- 李宗翰（2021）。大學教師流動性對學生輔導支持之影響。**高等教育評論**，34，73-95。
- 李明志（2021）。流動中的教學關係：大學兼任教師對學生支持角色的困境。**高教發展評論**，28(1)，21-38。
- 林佩君（2021）。高校輔導中心的資源瓶頸與因應策略。**心理輔導與諮商學刊**，12(2)，66-79。
- 教育部（2022）。大專院校學生輔導業務年報。取自：<https://depart.moe.edu.tw/ED2800/News.aspx?n=8BF117349E1FE052&sms=CB8E91DD2B4BC7AC>

- 陳怡君（2023）。修復式正義在大專校園的實施與挑戰。《學生事務研究》，10(1)，33-50。
- 黃怡萱（2020）。建構多元文化友善校園：大專院校實務經驗與策略。《學生事務工作季刊》，7(3)，16-29。
- Chang, Y. C., & Hsieh, M. H. (2020).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turnover and student counseling perform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Student Affairs*, 12(1), 45-60.
- Wang, T. L., & Lin, C. M. (2019). Higher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nd student accessibility: A review. *Taiwan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1(1), 15-29.

